·历史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4.006

兵农兼事:唐代边地祠庙与代北社会

史正玉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以茹仆射庙、拂云祠为代表的具有多元民族属性的边地祠庙,是唐代代北民俗的生动写照,也是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交往融合的见证,反映了边疆地区冲突与发展交融并存形势下特有的区域文化特征。代州地区的茹仆射信仰,兼具水神和武神的双重属性。唐前期在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茹仆射庙是地方家族把持农田水利、获取家族利益的重要工具。唐中后期随着人口减耗和农业荒废,茹仆射庙的军事价值越发凸显,其所在地成为关塞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祠庙的功能多元且随社会发展因时而易,但不同层级的军事护佑类庙宇同时存在,表明代北地区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当地祠庙具有突出的军事意义。

[关键词]唐代;代北;祠庙;民族融合;区域社会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4-0062-12

唐代代北地区,邻近北方民族政权,既是屏障内地的防御前线,也是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①。开元年间,唐王朝"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代北地区分属各镇节制,其中"河东最为天下雄镇""掎角朔方"②,体现了该区域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③。近来,笔者注意到唐代河东道、关内道北部的代州、单于都护府和三受降城等地有一些祠庙分布。祠庙作为信仰空间,官民在其中开展祈祷祭祀活动是其具备的基本功能;值得关注的是,学界部分学者对唐代祠庙信仰功能之外的社会价值进行了许多有益探讨④,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不同区域自然条件和社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古华北信仰空间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项目编号:ZX20240276);本研究成果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资助编号:GZC20231181)。

[作者简介]史正玉,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邮箱:nkuszy@163.com。

① 有关唐代代北地区范围的讨论,参见樊文礼:《唐末五代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孙瑜从历史地理、军事交通、职官的职属范围及唐代诗文等方面考论代北范围,参见孙瑜:《唐代代北范围考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②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太原府》,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1页。

③代北地区所属北方边地在唐代的战略地位演变,参见李鸿宾:《北方边地在唐朝的战略地位及其地位变化》,刘庆主编:《孙子兵法研究》(第1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154页,后收入其著作《疆域·权力·人群:隋唐史诸题专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6-106页。河曲地区三受降城等代北要塞在唐代北边防务中的重要作用,参见李鸿宾:《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53页;艾冲:《论唐代"河曲"内外驻防城群体的分布及其对北疆民族关系的作用》,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第131-146页。

④学界关于唐代祠庙研究的成果蔚为大观,从国家礼制及宗教诸层面对隋唐时期祠祀活动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综合社会因素讨论祠庙功能的研究,可参看鲁西奇对东海庙和石鹿山神信仰的发展与海滨居民社会生计问题之间关系的讨论,鲁西奇:《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夏炎对唐代泉神祠庙与地方官府保护、控制水利资源方式的分析,参见夏炎:《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史学集刊》,2021年第6期。

会发展情况有别,区域文化的呈现也各具特色。韦澳在《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中记述代州民俗:“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歉馑则剽劫,丰饱则柔从,互报怨仇,号为难制。不惮攻煞,所谓衽金革死而不厌者也。纵有编户,亦染戎风,比于他邦,实为难理”,揭示了代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人情①。具体到本文关注的茹仆射庙、李卫公庙等代北祠庙,根据传世文献和碑刻资料记载,它们似乎与唐朝腹地广泛分布的祠庙在社会功能的取向上同中有异。这些祠庙在当地社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修庙、祭祀等活动背后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了何种区域文化特征?本文拟结合碑文记载和祠庙所处地理空间,分析这些祠庙具备的社会功能。

一、茹仆射庙的营造与地方农业水利控制

今山西省代县口子村有青山寺,寺内茹公祠(茹仆射庙)居中在前,佛殿坐落在后,呈现出祠寺一体、前祠后寺的独特建筑格局。在茹公祠正殿山墙西壁上,嵌有金代石刻《唐茹仆射庙记》。此碑流传不广,笔者管见所及历代金石学著作未加著录,唯山西师范大学戏曲博物馆藏有1998拓印该碑拓片并作说明②。杨纯渊较早利用此碑简要论述唐代代州地区农业水利发展情形;赵新平、王超宇节录该碑文字,从信仰角度讨论了茹仆射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③。因目前尚未见公开出版物整理刊布此碑全文,为便研究,笔者据原碑录文如下:

尝闻称扬德善,莫非君子之□;发显功名,庶慰神明之意。夫庙者□有记耳,重修于元丰之间,里人父老相传□昔日唐时,西峨之水泛滥,直流于里中,久而为害居民。夫秉所司,由覆上知。乃命功臣姓茹□□□仆射于此祭而治之。其水自归于里东,民方获安,遂建其庙,岁时享祭。凡有祈祷,未尝弗应。里人屡欲立石,盖不知功德之讳,□以且已。段景里忽耕出□墓志,其上有文,与所传无异,云《上骑都尉茹仆射墓志》。茹公者讳汝升,字大济,其先段景三台山下人也。公气志雄豪,形貌魁硕。性直仁而有断,毅然不群。全尽忠尽节之名,有善始善终之誉。年当十八,□敌拒万千人,勇可类于关张,谋有同于信越。兴国安边,振威声于北狄;絜民□赐,除水患于□□。里人王善,一睹斯文,感叹不已,亦为宅与庙邻,与庙建石,首给所用,躬请当里王武□、王承直与诸父老等相□而议曰:兹神生有功德如此,使里中居民得安,至今犹自蒙其福也。□□知详,不铭诸石,传之久远,诚可惜哉。于是乃□命仆作记之文,仆以亦里人,义不可辞,勉叙其实,□之赞曰:

伟是神德,□灵□行。名高凰岭,威振雁门。兵行戎狄,谋和吴孙。一除水患,利及乡村。至今受赐,畴匪其尊。□雨如祷,禾稼乃蕃。比方□□,何日忘恩。后如取信,请□斯文。

进士王观国撰,里人张仲元书,进义校尉王敏行篆额。大定十二年八月初五日王善立石。④

①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敦煌文书P. 2511号残卷,文书照片及录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②碑身高、宽数据参见王福才编著:《山西师范大学戏曲博物馆馆藏拓本目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③参见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赵新平,王超宇:《水权与神权:清代五台山境域水利纠纷与庙宇权威——以代州峨河为例》,上海中山学社主编:《近代中国》(第33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96-97页。

④忻州师范学院赵新平老师惠示此碑照片,为笔者录文提供极大帮助,2023年8月笔者实地访查原碑,据原石再次校订碑文,文后尚有金代参与立碑者题名,与本文关注唐代史事无涉,为节约篇幅略去。

此碑立于金大定十二年(1172),碑文记述了唐代官员茹汝升因治西峨水灾有功而被当地百姓建庙祭祀。北宋元丰年间曾重修庙宇并立石,当地至晚在北宋已建成茹仆射庙。在历代碑石林立的寺观祠庙等信仰场所,前代碑刻所载庙宇历史,是后世石刻建立时的直接信息来源。《唐茹仆射庙记》作者王观国在撰碑时,不仅参考北宋元丰旧碑,他还见到出土的唐代《茹汝升墓志》,并核对志文"与所传无异"。在民间传说与唐代墓志的双重印证下,茹仆射庙始建于唐代,足资取信。

据墓志载,茹汝升"字大济,其先段景三台山下人也"。今代县东十余公里处有东、西段景村。"段景"之名与"断景(影)树"传说有关。明成化《山西通志》认为断景树传说与汉文帝有关[①]。乾隆《直隶代州志》据唐令狐楚撰《白杨神新庙碑》驳斥此说,指出断景树与北魏孝文帝有关[②]。段(断)景作为地名由来已久,其得名传说有唐代碑刻佐证并被后世方志延续。三台山,据万历《太原府志》载:"在代州东四十四里,三峰矗矗若泰阶。"[③]地名的连续性和得名传说及地形地貌的一致性,说明此方金碑的文本内容上承唐代碑志,下启后世方志,起到了地方知识传承的作用。

流传至今的方志中,最早记录茹汝升事迹及茹仆射庙(祠)沿革的是成化《山西通志》。其卷五《祠庙志》载"茹仆射祠,在代州西南二十里西峨谷口,唐仆射汝升洽峨谷水患及与民穿渠溉田,故民祀之";卷九《人物志》载"茹汝升,代州人。长安间为仆射。时本郡西峨谷之水泛溢,直流里中,民被其害。汝升承命祭而治之,水归里东,民获安业。郡里人慕其德,立庙祀之"[④]。从内容来看,方志所载基本沿袭《唐茹仆射庙记》记述,但方志直言茹汝升治水年代为武周长安年间,其功绩除治理水灾还有"穿渠溉田"等活动。方志所记更为详细的历史细节,溢出碑文所载内容,当源自前代方志对茹汝升墓志的编辑加工。结合碑文和方志所载,大体可知茹汝升活跃于武周长安年间,因代州水患,茹汝升作为地方官员奉命治水,平息水灾后,茹汝升又带领西峨河流域的居民兴修水利、灌溉田地。凭此功勋,茹汝升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并被建祠祭祀。茹汝升由人到神身份转换的第一重身份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神。

茹仆射庙成为供奉农业水利神的庙宇,有极强的现实需要。代州地区自唐初就开始进行屯田建设。贞观元年(627),张公谨任代州都督,"上表请置屯田以省转运"[⑤]。张俭检校代州都督,招抚流民"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边军大收其利"[⑥]。代州地区的屯田垦殖活动开展较早,在安抚流民、供给边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自然条件限制,此区域农业生产多仰赖河水灌溉[⑦]。茹仆射庙位于滹沱河支流西峨河上游,在茹汝升主导的沟渠灌溉工程完工后,西峨河流域水患风险大大降低,农业用水得到保障。据学者研究表明,唐代部分邻近泉流源头的祠庙具备水源控制的作用[⑧]。茹仆射庙也不例外,一方面茹汝升凭借治水之功被塑造为水神形象,其神通与百姓安全及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另一方面,祠庙扼守上游岸边,具备掌控水源的地理条件。合而观之,不难发现茹仆射庙在农业生产和水资源调配中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

---

①李侃修,胡谧撰:《(成化)山西通志》卷7《古迹》,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0页。

②吴重光纂修:《(乾隆)直隶代州志》卷1《舆地志·古迹》,乾隆四十九年刻本,第63页。令狐楚碑文参见李昉编:《文苑英华》卷876《白杨神新庙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623-4624页。

③关廷访,张慎言纂修:《(万历)太原府志》卷8《山川》,安捷主编,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太原府志集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④李侃修,胡谧撰:《(成化)山西通志》卷5《祠庙》,第189页;《(成化)山西通志》卷9《人物》,第508页。

⑤《旧唐书》卷68《张公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07页。

⑥《旧唐书》卷68《张俭传》,第2776页。

⑦现代化以前,代北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的调查情况,参见梁祥厚:《晋北忻定盆地概略》,《西北论衡》,1937年第5期。

⑧参见夏炎:《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史学集刊》,2021年第6期。

代州当地哪些人最有可能推动茹仆射庙的营建并从中获利呢?茹仆射庙祭祀对象为茹汝升,代州地区的茹姓一般与代北茹茹(蠕蠕)部有关。《元和姓纂》载茹姓渊源称:“《官氏志》:普陋茹氏改为茹氏。又蠕蠕入中国,亦为茹氏,音去声。”[①]唐代雁门县为代州治所,据贞元年间张贲然撰《忠武将军茹公神道碑》载,“在昔帝轩之裔,有控带绝,拥据群雄殆于斯万年,得茹茹之部,谓名王盛族,大人鸿胄。联华魏室,接庆齐庭。钟鼎焜耀于数朝,土田陪敦于烈辟。自拓跋宇文氏,降为著姓焉,则公之先也。公讳义忠,本家雁门,今为雁门人矣”[②]。唐代雁门一带有茹茹部后裔所改茹氏定居,此支茹氏家族祖上曾与北魏皇室通婚,十分显贵。到了唐代,这一系茹氏族人的郡望与族居地都已变为雁门。文宗时期,《王鍊墓志》载其“长女适雁门茹氏”。茹汝升为代州段景里人,应与茹义忠同属雁门茹氏。据咸通年间的《唐故天水郡尹府君合祔墓志》载,尹旺及妻高氏都卒、葬于代州,后“以咸通十一年十二月七日于代州凤池乡茹格村启柩灵椁”,迁葬至云州[③]。尹旺夫妻初葬于代州凤池乡茹格村。以村中人口集中的一到两个姓氏作为村名,是唐代乡村较为常见的命名方式。《格美墓志》载“君讳美,字行德,代郡雁门人也”[④]。据《格处仁墓志》,因其曾祖出任“后魏殄寇将军、雁门郡守,因而家焉”[⑤],可见雁门地区有格氏家族定居,代州凤池乡的茹格村正是以茹姓和格姓村民为主要成员的村落。

综上,雁门茹氏是代州地区定居历史悠久、家族成员众多且具备较高社会地位和乡里影响的家族。雁门茹氏族人有条件和动机将族人茹汝升塑造为水神。唐代地方强宗大族在乡里垄断水源的事例并不鲜见,大中十二年(858)郑薰在《祭梓华府君神文》中所述,宣州地区“讨击使余雄置石斗门,绝却一百三十户水利,自取此水,独浇己田”[⑥]。同样在大中年间,浑偘任职寿州时,“又勺陂之水,溉田数百顷,为力势者幸其肥美,决去其流以耕。公隄防约束,水复盛溢,沃野之利,岁岁增多”[⑦]。地方豪强占取当地水利的形式多样,雁门茹氏族人即通过茹仆射庙的选址来占据上游有利地形,进而把持水源,决定下游农田用水的多寡,故而后世方志才强调茹汝升“与民穿渠溉田,故民祀之”。而以同族名义把控祭祀权,又可获得祭祀中的香火收入。祠祭活动需要财物,楚州的伍相神庙“历代皆崇其祠,椎牛酾酒,小民有至破产者”[⑧],并州的妒神庙“泉水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⑨]。祭祀产生的香火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以扩充茹氏经济来源。同时,茹仆射庙之于茹氏族人,较之一般神庙还多了“宗祠”性质。对于茹汝升的后世子孙而言,茹仆射庙更可视之为“家庙”,崇祀自家先祖的庙宇得以建立,恢宏壮丽的祠庙建筑本身就是雁门茹氏家族声望与社会影响的具象投射。

①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8《九御·茹》,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06页。

②李昉编:《文苑英华》卷909《忠武将军茹公神道碑》,第4782页。

③墓志拓片及录文参见李玉明,王雅安主编;许德合分册主编:《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南郊区卷)》上编《现存石刻·唐故天水郡尹府君合祔墓志铭并序》,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④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152《大周故朝散大夫格府君志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56页。

⑤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唐故洺州司户参军事格府君(处仁)墓志铭并序》,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

⑥蔡帆认为余雄属于结托军府的地方土豪,参见蔡帆:《朝廷、藩镇、土豪:唐后期江淮地域政治与社会秩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142页。

⑦李昉编:《文苑英华》卷916《义昌军节度使浑公神道碑》,第4304页。

⑧李昉编:《文苑英华》卷815《楚州新修吴太宰伍相神庙记》,第4824页。

⑨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页。

二、武神形象与代北祠庙的军事护佑功能

茹汝升因治理水患、开渠溉田的功绩被代州百姓祭祀,但细读《唐茹仆射庙记》不难发现,碑文对其军事成就着墨颇多。除了兴修农田水利,兴国安边、保境安民是茹汝升的另一重要功德。碑文称:"公气志雄豪,形貌魁廓。性直仁而有断,毅然不群。全尽忠尽节之名,有善始善终之誉。年当十八,□敌拒万千人,勇可类于关张,谋有同于信越。兴国安边,振威声于北狄"。这段描述很可能转录自茹汝升墓志。在碑文的赞文部分写道"名高凰岭,威振雁门。兵行戎狄,谋和吴孙。一除水患,利及乡村。至今受赐,畴匪其尊",将茹汝升的军事成就与治水功德并举。茹汝升作为祠神,带有明显的武神特征。

茹汝升武神形象的建构,与代州战事频仍的区位特征有关。代州是太原的北部门户,战略意义非凡。一旦代州失守,太原将直接受到北方民族势力南侵的威胁。唐前期,河东北部地区主要承担防御突厥的军事职能;安史之乱后到唐末,回纥、沙陀等北方民族势力多次南下侵扰,代州在防御体系中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①]。代州治所雁门县北有句注等山,起到区隔内外、防御塞北的军事作用。武德二年(619),突厥始毕可汗"谋入抄掠,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②]。句注即句注山,《元和郡县图志》载:"句注在州西北三十五里,雁门县界西陉山是也";又引晋咸宁元年《句注碑》云:"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③]代州地处要冲,位于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通线上,具有重要的军事屏障功能,该区域的军事活动相当高频。

贞观年间,李靖担任代州道行军总管,统军攻灭东突厥,代州地区是行军必经之地,也是唐军重要据点[④]。高宗朝,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平定突厥阿史德温传叛乱,同样取道代州;其后,裴行俭率军讨伐阿史那伏念又"顿军于代州之陉口"[⑤]。垂拱二年(686),突厥阿史那骨咄禄入寇朔、代等州,唐军大败,死伤惨重。次年(687)八月,骨咄禄又寇朔州,唐军在黑齿常之率领下"击贼于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众遂散走碛北"[⑥]。总之,唐前期代州地区战事不断,代州凭借雁门之险,承担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之责。

茹汝升发迹于武周长安年间,其青年时期曾参与对北狄(突厥)作战。按照时间推算,早年令他"振威声于北狄"的战争很可能是高宗调露年间或睿宗垂拱年间唐军大胜的军事活动。正因成长于战事频发的代州地区,且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茹汝升在成为祠神后具备了军事保护神的属性。代州地区有军将在祠庙祈祷平安的风俗,《太平广记》引《河东记》载:

> 李存古尝为衙将。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摈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醮之。[⑦]

李存古原为河东衙将,因过被节度使范希朝贬斥于代州。为求平安,他多次在雁门的磨笄山神庙祝祷,遇赦还家后醮神酬其保护之德。《元和郡县图志》载蔚州飞狐县亦有磨笄祠,其建立与赵襄

---

①关于唐代前后期北方边地防务和战略地位变化的研究,参见李鸿宾:《北方边地在唐朝的战略地位及其地位变化》,《疆域·权力·人群:隋唐史诸题专论》,第96-106页。

②《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54页。

③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代州》,第401、402页。

④《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479页;《旧唐书》卷68《张公谨传》,第2507页;《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59页。

⑤《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第2803-2804页;《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66页。

⑥《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67页。

⑦李昉编:《太平广记》卷307《党国清》,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30页。

子攻杀代王、争夺代地的军事活动有关[①]。飞狐县与代州相去不远，代州磨笄信仰的传播和磨笄神祠的建立，可能受到飞狐县传说的影响。李存古的事迹与其身份皆透露了代州地区的文化风俗。因代州地处边地，战事不断，军人生命安全无从保障故寄望于神灵庇佑，常在神庙中祭祀祝祷。类比可知，《唐茹仆射庙记》之所以强调茹汝升的军事功绩，不仅因为茹汝升本人军功卓著，也由于当地的百姓和军人具有祈求和平、祷请胜利的信仰需求，故茹仆射庙也是一座具备军事护佑功能的祠庙[②]。

代北祠庙崇祀的具有军事护佑功能的祠神，除了茹汝升、磨笄夫人等地方神，还有名列国家祀典的武神。《宣室志》记载了宝历年间振武节度使张惟清在军城中移置李卫公庙：

>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劳，今庙宇隳残，飘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请。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鈭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坚珉，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焉。[③]

黑山一带是唐军与北方民族政权多次交战的地区。黑山之北建有李卫公庙，此庙当是纪念李靖平定突厥之功所建，也是唐军北上作战祈求胜利的场所[④]。在唐前期，可能还是唐军的军事据点。然而至宝历年间，黑山的李卫公庙已然破败残毁，振武节度使张惟清在军城中移建新庙。张惟清的修庙活动是在军府从事卢立的建议下实施的，说明李靖信仰在振武军府中下层将士中有一定信众基础，他们推动并参与了军城建庙。

李靖是唐朝官方祀典规定的武庙十哲之一。上元元年（760），肃宗下诏追封太公望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飨祭之典，一同文宣王"[⑤]。卫国公李靖和英国公李勣作为本朝名将代表，入选十哲从祀武成王庙[⑥]。振武节度辖下的黑山地区建立李卫公庙，一方面是因为李靖征讨突厥的赫赫战功威震代北，在曾经的战场建立李卫公庙可以威慑北方民族；另一方面李靖作为从祀武庙的名将，对其祭祀有据可循，边地建立李靖庙响应中央诏令，是唐王朝统治力及于边疆地区的体现。正因如此，张惟清才欣然答应在军城中营建新庙。

与振武军城李卫公庙建设同步推进的还有张惟清德政碑的上请与刻立。因张惟清治振武"有美化"，军府僚佐"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唐廷命中书舍人高鈭撰碑文，赐振武军刻石。考《旧唐书》，高鈭于宝历元年（825）十二月任中书舍人[⑦]。清末山西学者杨笃在《山右金石记》中著录《唐振武节度使单于大都护府张维（惟）清政绩碑》，记曰："宝历二年，高鈭撰，旧在和林格尔厅北。"[⑧]这些材料说明《宣室志》所载之事虽具神异色彩，其基本史事则相对可信。建庙工人挖出带有

---

①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蔚州》，第406页。

②晋州霍山庙、蒲州河渎庙、恒州北岳庙等祠庙均举行过统帅祈求军事胜利的祭祀活动，这是北方军事活动频繁地区祠庙所具备的常规功能。

③张读撰：《宣室志》卷7《天赐碑石》，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④李荣辉认为此处黑山与李卫公庙的位置在今和林格尔县境内，参见李荣辉：《唐代单于都护府李卫公庙与卫公信仰》，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60–168页。

⑤杜佑：《通典》卷53《吉礼·太公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84页。

⑥王溥撰：《唐会要》卷23《武成王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508页。

⑦《旧唐书》卷168《高鈭传》，第4387页。

⑧杨笃：《山右金石记》卷10《补遗·唐振武节度使单于大都护府张维清政绩碑》，太原：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第963–964页。

“张”字的奇石并献给张惟清,军府从事卢立将神人托梦的故事与之附会,最终张惟清将中央颁赐的德政碑文刻在这块奇石上。重修李卫公庙与请立张惟清德政碑都由军府将士推动,德政碑的上请在前,修庙发生于碑文颁赐后。带有军事护佑功能的李卫公庙正是为了宣扬德政、增添长官神异的配套工程。

振武军城的李卫公庙既有中下层军士作为信众基础,又在唐廷中央与振武地方联动过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尽管张惟清有借修庙为自己刻碑立石宣扬德政的私心,但通过讲述李靖托梦迁庙和天赐碑石的神异故事,既能借重李靖威名树立张惟清的高大形象,巩固其统帅地位,又能为驻守军城的将士提供寻求庇佑、举行祠祀的场所,可以凝聚众心、鼓舞士气。李卫公庙作为边地祠庙,在军府内部起到沟通上下、团结将士的作用。供奉武庙十哲之一的李卫公,符合国家祀典,此庙的存在象征着王朝统治与教化远及边地,军府主帅的建庙活动也是对中央诏令的反馈。这种强化中央统治和边地治理的良性互动,借由李卫公庙的移置实现,并伴随着张惟清德政碑的上请与刻立而增添一份神圣色彩。

总之,代北地区因战事频繁,无论是地方百姓还是边地将士,都有祈求平安、祷请胜利的信仰需要。代北地区崇祀的具有军事护佑功能的祠庙类型多样。磨笄夫人信仰发展历史悠久,在小区域内已呈现播迁态势。茹汝升成神时间较短,但作为本地武神,地方性却更突出。以磨笄夫人、茹汝升为代表,由代北先贤转化而成的祠神,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而李靖这类被列入官方祀典、被多地祭祀,甚至在全国影响广泛的祠神[①],则明显带有中央性。尽管如此,李卫公庙在振武军辖下的移置案例表明,中央性显著的祠神依旧能够被边地改造利用,并在央地互动中发挥作用。

三、代北关塞体系中的祠庙及其军事战略价值

如前所述,唐前期的茹仆射庙,是雁门茹氏家族支持营建的、以控制农田水源为目的从而维持乡里家族势力的祠庙。但是到了唐中后期,随着代州形势的改变,茹仆射庙的主要功能发生了变化。代州地区在唐前、后期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人口的急剧减少。唐代户口在安史之乱期间遭到严重摧残,边远地区的人口数量较唐前期大幅缩减[②]。具体到代州,《通典》载其人口规模称:“户二万一千二十,口十万一千四百五十。”[③]《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代州,雁门。中都督府,开元户一万五千七十七,乡二十八;元和户二千一百二十,乡四十。”[④]《旧唐书·地理志》载:“旧领县五,户九千二百五十九,口三万六千二百三十四。天宝,户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口十万三百五十。”[⑤]《新唐书·地理志》相关数据为:“户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口十万三百五十。县五。”[⑥]据研究,《旧唐书》所记“旧领”县、户口数,为贞观十三年之数据[⑦]。由上述记录可知,代州的户籍数量自贞观年间一直呈增长趋势,至天宝时达到顶峰,人口超过十万。然而,经过安史之乱的摧残,元和初年代州地区的在籍户数

①唐代晋州霍山一带流传李靖代龙神行雨的传说,既说明李靖信仰分布的广泛,也说明不同地区现实条件不同,在信仰表现形式和功能需求上呈现出差异。

②有关唐代人口的演变及相关问题的综合研究,参见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杜佑:《通典》卷179《州郡九·古冀州下·雁门郡》,第4741页。

④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代州》,第401页。

⑤《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东道》,第1483页。

⑥《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河东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06页。

⑦岑仲勉:《〈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第131-157页。

仅剩两千余户,只有极盛时的十分之一左右。

元和年间代州的人口不仅远远不及开元天宝时期,比之唐初贞观年间也大为不如。这样的人口规模,很难维持大规模的农田垦殖[①]。元和年间,振武军因缺乏粮食发生军乱,韩重华在宰相的支持下,广开屯田以解决"振武军饥"问题。在韩重华主持下,东自云州西达中受降城的广阔区域内,适宜开垦的地区都进行了屯田和军事工事的建设。在此期间韩重华任职代州刺史、代北水运使,办公地点在代州:

>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②]

严耕望认为代州所设置的代北水运院,管理汾河上游、滹沱河上游及桑乾河的水运,主事者于代州积谷馈运以助边疆防务[③]。李锦绣在此基础上申论:将水运使和籴谷基地设于代州,可利用商业运购河北道谷粮,顺滹沱河与桑乾河运至代州,供河塞边军[④]。总之,代州是转运河北及南方粮谷物资供给边军的重要水陆枢纽,在北方边地防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韩重华启用的屯田之人为"赃罪吏九百余人",可见代州当地及代州以北的广大区域,"缘无居人,久绝耕种",实在无足够的人口从事农业耕种,不得不依靠罪犯囚徒充当劳动力。在人口大幅缩减、农田大量撂荒的背景下,茹氏家族利用茹仆射庙把持农田水利的现实基础越发薄弱。

前文已论,茹仆射除了水神功能,还具备武神属性。茹仆射庙位于滹沱河上游河谷地带,在代州城与滹沱河以南的地势较高处。严耕望考论滹沱河上游河谷是沟通河东、河北的重要通道,具有极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⑤]。

安史之乱爆发后,"禄山遣大同军使高秀巖寇河曲,子仪击败之,进收云中马邑,开东陉"[⑥]。东陉即东陉关,与西陉关同为代州门户[⑦],据杜佑记载:"(雁门)郡南三十里有东陉关,甚险固。"[⑧]郭子

---

①丸桥充拓根据唐中后期的史料指出,该阶段北方边地屯田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耕地之人。参见丸桥充拓:《唐代"北边"财政研究》,丸桥充拓著,张桦译:《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2页。

②《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3页。

③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3-1394页。

④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何汝泉、孙瑜及日本学者丸桥充拓分别对代北水运使职能进行考证,虽详略不一、各有出入,但总体上都认为代州所设水运使院的主要作用是转运物资以供代北军需。参见何汝泉:《唐代地方运使述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孙瑜:《唐代代北范围考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丸桥充拓著,张桦译:《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第92-96页。李佳认为汾河、滹沱河及桑乾河三河运量有限,不足为之专门设水运使院,其说有一定道理,但其也认可代北水运使于代州办公,筹措粮草供给振武、天德等边军。参见李佳:《唐中后期河曲地区的黄河水运》,《文史》,2022年第2期。

⑤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第1366-1373页。建中四年(783)李晟率兵自定州赴奉天之难,行军即取此道,参见《旧唐书》卷133《李晟传》,第3663页。元和年间,刘总谋夺幽州节度使之位,诈称长安使者所经线路也为此道,参见《旧唐书》卷143《刘总传》,第3902页。此处也是连接中原和代北的重要枢纽地带。

⑥《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49页。

⑦《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河东道》,第1006页。西陉关即古雁门关所在地,位于今代县雁门关镇白草口村,相关研究参见史念海:《论雁门关》,《河山集》(第4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426页;靳生禾,谢鸿喜:《关于雁门关年龄、遗址的考证和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⑧杜佑:《通典》卷179《州郡九·古冀州下·雁门郡》,第4741页。

仪突破东陉关才得以南下,进而引军东进河北与史思明部大战。尽管史书用"开东陉"三字将具体战斗过程一笔带过,但此关口的打通决定了后续战争走势,在此区域的争夺战斗一定异常激烈。东陉关在代州城南三十里的位置,扼守代州北门户的西陉关不开,前往东陉关的路线只能从滹沱河上游顺流而下突进。史念海认为东陉关在今代县西北方向的胡峪乡,但此判断与杜佑的记载相背[①]。近有研究指出,唐代东陉关可能在今代县东南方向的峪口乡[②]。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则提示了东陉关所在位置的新线索。敦煌文书P. 2511号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之残卷,记载了各地山川形胜与水陆津要,所载代州军事要地:"塞曰百嵎偏岭、东尖、覆宿(一名牛心山也)、大王石井、叠头、西峨(以上并塞上山名,在雁门界是也)。"[③]据此可知唐代中后期,代州境内关塞有西峨塞,塞以山谷为名。西峨塞入选代州"地名要略",说明晚唐时期该区域的军事战略意义愈加突出。

方志所载代州西峨谷的方位有两种说法:一说西峨谷在代州东北方向的夏屋山侧,一说西峨谷在代州西南二十余里处(即茹仆射庙所在之地)。《大明一统志》载夏屋山"山之侧有西峨谷"[④]。光绪《代州志》考订此说,认为"旧《志》山侧有西峨谷,误。峨谷在滹沱河南,地望迥别,无因袭其名也"[⑤]。考《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等唐宋时期地理志书对夏屋山的记载,皆未见"侧有西峨谷"的描述。特别是《太平寰宇记》对代州风俗的介绍,几乎照抄韦澳代州"人俗"条,《太平寰宇记》载"覆宿山,一名牛心山",也明显借鉴《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内容[⑥]。可见乐史在编写《太平寰宇记》时,参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文本或它们共同的史源,那他应当看到代州有西峨山的记载,却未将"西峨"置于夏屋山条目下,说明"西峨"与"夏屋"并非一地。因此"夏屋山侧有西峨谷"是较晚出现的观点,光绪《代州志》的驳斥是有道理的。那么,唐代与"西峨"相关的地名,都位于代州南部,也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中所记代名为"西峨"的关塞,与茹仆射庙一样,位于西峨谷一带。

茹仆射庙位于西峨谷口,是西峨河水出山、山地与河谷低地过渡的地段。相较于地势低洼的西峨河下游地区和紧邻滹沱河岸的代州城,祠庙所在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且临近水源,是营建关塞的绝佳位置,《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所载西峨塞极有可能就位于此。西峨谷口在方位和距离上都十分接近杜佑"郡南三十里有东陉关"的描述,西峨塞很有可能就是东陉关的别称或附属堡塞。

郭子仪开东陉关后,云州的高秀岩势力暂时被唐军隔绝于代州以北,但并未被完全消灭。此时河北通向河东的井陉道重归唐军掌控,叛军由河北北部进入河东的道路只剩下由易州、定州、恒州等地沿滱水循莎泉道、灵丘道,沿滹沱河上游谷道通往代州的路线[⑦]。茹仆射庙是这条行军路线上一处高地,无论是设垒防御还是居高伏击俯冲,都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张光晟击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北人乃安"[⑧]。《新唐书》载之更详:"回纥袭振武,攻东陉,入寇太原。河东节度使鲍防与战阳曲,防败绩,残杀万人。代州都督张光晟又战羊虎谷,破之,虏乃去。"[⑨]这场回纥与唐军的战斗,东陉关又成为重要的关节点,回纥破关南下,太原直接面临

①参见史念海:《论雁门关》,第402-426页。

②参见续楠,王海:《"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3期。

③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72页。相关研究参见赵庶洋:《敦煌写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抄写年代及别名考》,《文献》,2015年第6期;冯雷:《敦煌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史源综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辑。

④李贤撰,方志远点校:《大明一统志》卷19《太原府·山川》,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版,第786页。

⑤俞廉三纂修,杨笃参订:《(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光绪八年代山书院刻本,第24页。

⑥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十·代州·雁门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26页。

⑦相关分析参见续楠,王海:《"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3期。

⑧《旧唐书》卷11《代宗纪》,第314页。

⑨《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第6121页。

风险。最终代州刺史张光晟在滹沱河西岸的羊虎谷击溃回纥军，才保河东安宁。东陉、西陉二关，一南一北，是拱卫代州的重要门户，关塞失守则代州沦陷，太原也不能独存。茹仆射庙所在的谷口地带是屏障东陉关的关键区域，也是组成太原北部防线的重要部分[①]。

寺观祠庙等建筑群，一般占地宽广、建筑众多，本身便于驻军、适合防守，在战争期间容易成为战争双方交战、争夺的据点。“宝应初岁，王师北伐。奋其威武，或以火攻。秉秆翕其延烧，积薪吁其可扑。由是寺门夷荡，鞠为灰烬。”[②]魏州开元寺在安史之乱中成为交战场地，寺门被战火损坏。同样为宝应年间，“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之，阵于昭觉寺，官军骤击之，杀伤甚众，而贼阵不动；鱼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战，贼虽多死者，阵亦如初”[③]。史朝义布阵于昭觉寺，在寺院建筑的掩护下，即使遭遇唐军冲锋仍能保持军阵稳定。这场战役充分体现了占据地形优越的寺院建筑群兼具易守难攻的军事防御功能。祠庙建筑与佛寺具备相似功能，大顺二年（891），杨守厚、杨守忠等人作乱，其中“龙剑武宣二军，往来绵剑间。掠人民，焚庐舍。入灵应行祠，翦伐林木，饲马殿庭”[④]。乱军进入灵应庙中，砍伐树木，在庭院中喂马。他们之所以入祠庙中，一方面看重庙址的防御功能，且庙内高大树木可以用来制造防御工事；另一方面祠庙庭院的宽敞空间可以休憩兵马，为他们提供安营扎寨的现成场地。

代北地区最能说明祠庙与军事要塞之间复杂关系和边地祠庙的军事战略价值的案例，非河曲地区的张仁愿庙、拂云祠、中受降城等关联建筑莫属[⑤]。中受降城由拂云祠扩建而成，城中又设置具有军事护佑功能的张仁愿庙。三受降城系张仁愿营建的北方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元和郡县图志》载其营建过程：

> 景云三年张仁愿所置也。初，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咤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代之。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奏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绝其南寇之路……中宗竟从之……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遥相应接。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⑦]

中受降城由拂云祠扩建而成，说明祠庙的建筑空间具备军事价值，建筑构件有改造为军事工事的功能[⑧]。而在军事活动中，不仅唐军将帅有在祠庙中祈求军事顺利的习惯，突厥等北方民族也有类似的文化传统。因此，祠庙作为信仰场所，首先满足了作战军士渴望得到庇佑、获得战争胜利的心理需求。除了在祠庙中祈祷获胜，突厥前往拂云祠还有现实的军事需要。吕温在《三受降城碑

---

①笔者于2023年8月5日前往代县口子村实地调研，青山寺（茹公祠）现位于口子村村委会后小丘上。除《唐茹仆射庙记》，庙中尚存清碑数通。青山寺后高地遗存炮台一处，另据口子村刘勇恒老先生介绍，抗战期间八路军曾以此寺作为根据地，并有烈士牺牲长眠于此。综合地形地势及相关战役，可以确知此地的军事战略价值。

②李昉编：《文苑英华》卷863《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第4553页。

③司马光编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22《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253页。

④董诰编：《全唐文》卷819《灵应庙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33页。

⑤有关唐代拂云祠含义的讨论，参见蔡鸿生：《突厥奉佛史事辨析》，《蔡鸿生史学文编》第3编《突厥汗国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56页。

⑥有关三受降城在唐代北方地区的防御功能的研究，参见李鸿宾：《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第143-153页。

⑦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丰州·西受降城》，第116-117页。

⑧中受降城遗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共青农场敖陶窑古城，参见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铭》中讲到“有拂云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枢会。虏伏其下,以窥域中。祷神观兵,然后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来。鲸一跃而吞舟,虎数步而择肉。塞草落而边甿惧,河冰坚而羽檄走”[①]。拂云祠建在黄河北岸的拂云堆上,其地高亢平坦,突厥伏兵其上可以窥看黄河南岸唐军动向,伺机而后动。突厥骑兵借助地形俯冲南下,占尽先机;唐军则面对突然袭击应对失措,容易陷于被动。张仁愿夺取河北之地后,在拂云祠基础上扩建的中受降城成为北部边防体系重要的一环。此则说明,军事频仍的地区,祠庙的选址有战争因素的考量。

占据拂云堆高地,唐军的防守压力减轻不少,甚至对外的攻守形势也发生变化。正如李华在《韩国公张仁愿庙碑铭》中所言:

> 夺堑拂云,堆而城之。并河之阿,列筑三镇。将精士锐,谈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视,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则乘冰转斗,无日无之。既而据河山玩其动静,纳行旅归之衽席。凭墉而望,匹马单兵,不匿形影。虏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无草窃之虞,天下减征役之半矣。[②]

夺取拂云堆高地后,唐军凭借有利地形,可以有效监测突厥等北方民族的军事动向,“匹马单兵,不匿形影”。元和年间,“会吐蕃攻盐、丰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云堆,虏引去”[③]。振武节度使高霞寓屯兵拂云堆,配合其他事活动,有效震慑吐蕃军队。李德裕论北方防务,称“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云祠,最是要地”并非虚语[④]。由于张仁愿的巨大功绩和突出的军事才能,其本人获得“三城立庙,军帅乞灵则祠之”[⑤]的待遇。三受降城皆建张仁愿庙,中受降城也不例外。作为军事要塞的中受降城,镇守的将帅在军事行动前入张仁愿庙祭祀,祈求军事胜利,则是利用祠神的军事护佑功能提振士气。总之,军事要地的祠庙兼具现实战略价值和精神鼓舞作用,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四、结语

有唐一代,代北地区始终面临北方民族南下的军事压力,唐前期代北边军主要参与对突厥作战,安史之乱后则重点应对回纥势力的掳掠侵扰。晚唐时期沙陀崛起于代北,代州本是阻击沙陀势力的前线,被李克用占据后则成为沙陀南下的根据地。河曲地区也与代州近似,始终担负着边疆防御的重要职能,在抵御突厥、吐蕃、党项侵扰方面意义巨大。尽管唐朝北方边地战争不断,但多民族的交流、交往与融合也不断深化。代州茹仆射庙祭祀的茹汝升是代北蠕蠕部后裔,中受降城是张仁愿夺取突厥人祷祀的拂云祠后改建而成。这些祠庙的存在,正是代北地区“封略之内,杂虏所居”“纵有编户,亦染戎风”的生动写照,也是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民族交往和融合的见证,反映了边疆地区冲突与发展交融并存形势下特有的区域文化属性。

祠庙作为信仰场所,开展祭祀活动、满足信仰需求是其具备的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但不同地区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有别,相应的各地祠庙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地方社会中影响广泛的大型祠庙,其社会功能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以茹仆射庙为例,祭祀空间的建立满足了代地百姓崇敬英雄人物和家族先贤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其信仰功能。而以祠祭活动为纽带,以共同建庙为契机,实现地方大族如雁门茹氏的力量整合,为他们攫取农田水利

①吕温:《吕衡州集》卷6《三受降城碑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9页。

②李华:《李遐叔文集》卷4《韩公庙碑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③《新唐书》卷141《高霞寓传》,第4662页。

④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13《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79页。

⑤李华:《李遐叔文集》卷4《韩公庙碑铭并序》,第78页。

和乡里声望等有形及无形的社会资源提供了可能性,这是祠庙在地方大族发展势力中发挥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代北地区战事频繁,无论地方百姓还是边地将士都具有祈求平安、祷请胜利的信仰需要,因此祠神的武神形象鲜明,茹仆射庙由此具备军事护佑功能。和平时期,地方大族通过控制此庙占据水利,掌握农业资源和经济收益;在战争期间,茹仆射庙与西峨塞、东陉关等关塞防御建筑遥相呼应、互为依存,其地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价值凸显。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在祠庙中活动内容和利益诉求随形势变化而易。

尽管祠庙的功能是多元的,但代北地区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当地祠庙的核心功能与唐朝腹地的众多祠庙有所区别。如果说以信仰的方式占有水利等农业资源,是代北祠庙与内地祠庙的共性,那么显著的军事功能则是代北祠庙的主要特征。其表现之一即为代北崇祀的具有军事护佑功能的祠神类型多样,既有区域文化特征显著的地方祠神,也有列入官方祀典、中央下诏崇祀的正统武神。同时,茹仆射庙与东陉关、西峨塞的空间联系,拂云祠、中受降城、张仁愿庙相互嵌套的建筑格局,表明一些代北祠庙本身是关塞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唐律疏议》引《军防令》称:"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又云"此非正役,不责全功,自须苦乐均平,量力驱使。"[①]在边防地区有制度规定对防人的军事任务以外的生产生活内容进行约束,但律令规定也提出了"苦乐均平,量力驱使"的管理要求。张仁愿、张惟清等边地统帅,以兴建或改造祠庙的方式,兼顾了军民的精神需求和现实需要,提振士气、凝聚军心,他们的治理措施也侧面体现了唐代代北祠庙具有突出的军事意义。

[责任编辑:马晓雪]

①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卷16《擅兴·遣番代违限》,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06-1207页。